

劳工运动与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身份建构 (1880—1920)*

杨 静^①

摘 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东、南欧女性移民潮。该移民群体大都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进入就业市场,并在就业过程中遭受超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低工资水平和工作岗位上严重的性别歧视等困境。再加上这些移民群体本身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最终走上了加入劳工组织和开展罢工运动的道路。通过参与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移民女性从本民族群体汲取文化归属感的同时又结合在美国新环境中形成了挣工资者、养家者、消费者、各种组织的管理和参加者等新身份。这种新身份既不同于欧洲母国女性也有别于美国土生白人女性。

关键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东、南欧女性移民;劳工运动;身份建构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头十年,^②共有超过 600 万外来女性移民美国,其中来自俄国、波兰、奥匈帝国、意大利等东、南欧地区的女性移民异军突起,数量高达 230 余万人,所占外来女性移民的比例也从 19 世纪 70 年代的 7%

*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参与活动及其影响研究(1880—1920)”(项目编号:2020PY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作者简介:杨静,女,1982 年生,河南安阳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妇女史与移民史。

② 美国移民委员会对 1893、1894、1895、1899 等四个年份的外来移民统计没有进行性别区分,所以本文中的数据并不包括这四年。

上升到20世纪头十年的68%。^①进入美国后,东、南欧移民女性大都因为生活贫困而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她们通过外出就业、家庭分包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增加了与其他移民群体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接触与互动,因而吸收了不同以往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并且最终构建起了兼有欧洲传统和现代美国印记的“新女性”形象和身份认同。

美国史学界对于该时期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从女性移民史的角度将东、南欧女性移民作为美国外来女性移民的一部分探究其移民经历^②,也有聚焦于不同族群的移民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和劳工运动的研究^③,还有探究移民女性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成果。^④国内关于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较为有限。^⑤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集中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移民群体参与劳工运动对其构建“新女性”身份的影响,从而管窥东、南欧女性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机制和特点,以期对了解该时期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历史有所裨益。

① 此处的人口数量和比例皆由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参见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ume 3, Statistical Review of Immigration, 1820—1910—Distribution of Immigrants 1850—1900*, Senate Document No. 756,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138, 240, 352.

② Doris Weatherford, *Foreign and Female: Immigrant Women in America, 1840—193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George E. Pozzetta, *Ethnicity and Gender: The Immigrant Woma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1; Donna Gabaccia, *From the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Younger Dickinson, *The Role of the Immigrant Woman in the U.S. Labor Force, 1890—1910*,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5; 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Kathie Friedman-Kasaba, *Memories of Migration: Gender, Ethnicity, and Work in the Lives of Jewish and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1870—192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Elizas Tcherikower, *The Early Jewish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1961.

④ Donna R. Gabaccia, *From Sicily to Elizabeth Street: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Italian Immigrants, 1880—193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and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Ka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 Century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⑤ 国内学界关于该时期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专题性的研究论文参见何黎萍、侯俊玲、孙静静:《20世纪初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女工境遇探析——以纽约市三角衬衫厂火灾为例》,《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杨静:《美国主流社会对东、南欧女性移民的负面认知与社会改革(1880—1920)》,《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另外还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参见崔玉娟:《美国犹太妇女社会地位研究:以东欧犹太妇女为例(1881—1914)》,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蓝璘:《大觉醒:美国女权运动影响对美国犹太社会妇女的影响》,重庆:四川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此外,国内有关美国东、南欧整体移民群体的研究成果中,对女性移民也有所涉及。参见李爱慧:《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王寅:《美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一、东、南欧移民女性走向劳工运动的原因

首先,东、南欧移民女性最终选择走向劳工运动,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了残酷的剥削和不公正的待遇,主要体现在超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低工资水平和工作岗位上严重的性别歧视等方面。从美国当时就业市场的大环境来看,所有劳工的就业环境都比较令人担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商业和劳工部关于全国女性和儿童的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就业状态整体表现出频繁更换工作、超长的工作时间、低收入和缺乏卫生、安全保证的工作环境等问题。^①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以俄国犹太和意大利女性为代表的东、南欧移民女性的工作环境更为糟糕。由于她们刚到美国,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对经济收入的迫切需求促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条件更差,工资更低的工作。一份对美国服装产业工人的调查显示:犹太女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高达10小时,有时甚至超过14个小时,而且需要一周连续工作6天,有时全周都没有休息时间。^②几乎所有的调查和研究都显示,尽管不乏个别女工的工资收入有高于男性的现象,但从整体而言,女性的收入水平普遍都远低于男性。美国人口普查局选取1899至1914年中的单个年份的年度工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男士服装业的女性工人平均年工资略低于男性的一半,而在女士服装业中女性年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52%。^③美国劳工局在1907至1908年对5座城市的男士服装产业工人的工资单的调查显示,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例如在芝加哥,女性的平均周工资是男性的70%,大约为7美元;而在纽约女性服装工人的周工资为男性的60%,不到7美元。^④即便是女性和男性在相同岗位从事同种工作,男性也比女性的工资要高。在1907至1908年的周工资抽样调查显示,芝加哥女性缝纫机操作员的工资是8.56美元,男性是9.87美元。在纽约,男士大衣厂的男性熟练技术手

①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Labor, *Report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9: *History of Women i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Doc. 645, 61st Cong., 2d Sess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 p.11.

② Joseph Schlossberg, *The Rise of the Clothing Workers*, *Amalgamated Educational Pamphlets*, New York: 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 1921, p.5.

③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arning of Factory Workers 1899 to 192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 p.100.

④ *Reports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vol. 2: *Men's Ready-Made Clothing*, Senate Document No. 747, 61st Cong., 3r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 130-131.

工缝纫工人的周工资是10.23美元,而在相同岗位上的熟练女工的工资是7.20美元。^①一位工厂主毫不掩饰地说:“我非常愿意用刚刚离开欧洲落后农村来美国的女工,她们既不会讲英语,也没地方可去。我给她们工作,就等于给了她们生存的机会。因此,仅仅付极少的工资,我便可以任意地役使她们。”^②作为移民,由于宗教、文化和长相等方面与美国本土人的相异性,这些女性群体几乎无缘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体面职业。根据美国妇女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3.9%的新移民女性从事白领行业。^③而那些在传统手工作坊工作的移民女性面临的环境更差。例如,犹太移民社区的分包合同制生产就是典型的传统小作坊生产模式,这种小作坊称为“血汗工厂”。这些小作坊大都聚集在移民社区旧式建筑中黑暗的小巷子里,既被作为移民的生产空间同时也是生活空间。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堆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整个生产环境既混乱又肮脏。特别是在夏季和生产旺季时期,狭窄的工作空间就会变得更加闷热和气味难闻,严重威胁工人的健康。20世纪初期,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社会调查中就显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糟糕局面。在瓦里克街(Varick Street)的一个地下室公寓里有一家作坊式的糖厂,老板一共雇佣三个移民女工,但是由于工厂是由住宿公寓改建而成,木质地面非常潮湿,而且黏胶性较强,并不适合制糖的生产。这些移民女性每天只能点瓦斯灯工作,工作时的照明状况非常差。^④糟糕的工作环境时刻威胁着移民女工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都难以得到保障。1911年3月25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州的“三角工厂”火灾便是典型案例。

其次,东、南欧女性移民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这与移民女性在欧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也息息相关。东、南欧移民女性在欧洲母国时,就已经接触到了激进的反抗文化。从19世纪早期开始,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并开始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压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

① 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8

② Joel Seidman, *The Needle Trades*,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2, p.37.

③ Caroline Manning, *The Immigrant Women and Her Job*,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0, pp.74-75.

④ Louise C. Odencrant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9, p.68.

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代表的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也随之诞生,并开始广泛传播。从19世纪末期开始,俄国犹太隔离区(Shtetle)中就已经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的激进思想,并逐步发展壮大。美国著名犹太移民劳工运动史研究专家以斯拉·门德尔松(Ezra Mendelsohn)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对俄国犹太人有莫大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他们在俄国长期受到政治、经济压迫。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平等观念,特别是其中许诺的平等参与政治和经济的机会,成为犹太民族迅速接纳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众在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渐失去了对犹太宗教领袖的信任,工匠和新兴的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成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甚至革命运动的支持先锋。^①社会主义对于犹太女性也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犹太女性长期遭受来自民族、阶级、性别的压迫,她们也迫切希望在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变革中,可以赋予犹太女性平等的社会角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俄国犹太人源源不断地移往美国,这种激进主义思想就开始慢慢渗入美国社会。

1905年俄国革命是美国犹太移民劳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俄国革命失败后,很多主张社会主义的激进人士选择到美国避难,因此,也壮大了美国的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力量。这些激进主义先锋和领袖开始在美国的工厂进行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政治主张开始在美国工厂里广泛流传,给美国工厂里的犹太工人带来了新的政治和阶级思想意识。一位在纽约市从事内衣生产的犹太女工描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非常仰慕这位刚来的大姐,她是一位激进分子,她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姐姐也是激进分子。所以,她在欧洲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有斗争经验。她说话做事都非常干练爽利,但是她的父母也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所以我很愿意跟她在一起工作、聊天。而我原本是个性格安静的人,而且非常胆小怯懦,但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有了更多是非曲直的认识,但是我还是不敢像她那样说出来,但是我喜欢跟着她做事,后

^① Ezra Mendelsohn, *Class Struggle in the Pale: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Jewish Workers' Movement in Tsarist Russ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7, 98-107.

来她在罢工中成了工人纠察队骨干,在她的鼓励下我也参加了劳工运动。她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所有参与罢工的女性工友的主心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让我们大家更有勇气和信心战斗下去。^①

这种女性社会主义者到美国后启发同胞参与劳工运动的事情,在美国的工业城市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期,整个纽约下东区的出版业、剧院、沙龙、俱乐部中,变革社会秩序等话题是颇为常见的核心谈话内容。^②而在其他城市,社会主义思想也在移民社区内不断的扩散,一位住在芝加哥移民社区的犹太女性说:“在20世纪初期,空气里都弥散着运动的气息。”在纽约、波士顿、纽瓦克、芝加哥等工业化城市的犹太移民社区中,社会主义者在街头、公园里、商店和工厂里演讲,宣传新社会、新经济、新秩序的迫切性,以及成立工会和发动劳工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犹太移民可以随手拿起报纸《犹太前进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或者随便到哪个街角听听演讲或者人们的议论,都能获得激进主义思想。^③

意大利移民女性虽然在劳工运动中不似犹太移民女性表现那般突出,但是她们在意大利母国时期也接触到了不少激进主义的思想。例如意大利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人社团活动等等。19世纪末,意大利城市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与资本家对立的阶级意识,并逐渐影响到了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工人甚至农民。同样,随着意大利移民涌入美国,来自意大利不同群体的激进分子也将这些思想带到了新大陆,对其他移民群体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④但是意大利社会的左翼激进主义与俄国的犹太人相比要弱得多,主要是不同激进主义团体间存在的严重的分歧。例如,社会主义者与更具反叛性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分歧,削弱了意大利激进群体力量的团结和社会影响力。

①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p184.

② Mary Kingsbiruy Simkhovitch, *Neighborhood: My Story of Greenwich House*, New York: Norton, 1938, p.63.

③ Charles Leinenweber, "Socialists in the Streets: The New York City Socialist Party in Working Class Neighborhoods, 1908-1918," *Science and Society*, vol.41, 1977, pp.152-177.

④ Miriam Cohen, *Workshop to office two generations of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 1900-1950*,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8.

最后,美国历史上男性的劳工运动以及其他移民女性群体走向集体反抗和劳工联盟的例子也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美国历史上,男性工人起来反抗资本家的罢工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早在1806年,费城便爆发过皮鞋制造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的工人开始团结起来转向独立的政治活动,他们通过工人运动尤其是罢工互动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从长远来看,这些工人运动促使了美国男性工会的产生和发展,推动男性工人在劳动时间、工资福利,以及工作环境方面的改善。因此,男性工人的斗争模式无疑会为作为后来者的女性所效仿。女性一直是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财产权、选举权等基本权利长期丧失。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才开始大规模走出家庭进入就业领域,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并不断地争取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性别平等。对于外来移民女性而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平更甚,因此,女性的反抗也很常见。例如,1869年爱尔兰移民女性在纽约州特洛伊峰市(Troy)的衬衣领子制造女工大罢工,1885年在纽约北部的一家毛毯厂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女工的联合罢工。^①虽然以上这些其他历史时期的移民女性的反抗,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都无法和20世纪初期新移民女性的劳工运动相比,但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激励和榜样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着新移民女性群体建立工会组织和发起劳工运动。

二、移民女性劳工组织与劳工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东、南欧移民女性劳工运动最频发的领域是服装行业。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东、南欧移民女性集中于该行业,在行业中容易积聚反抗的力量。1900年7月,纽约下东区服装工人(主要是犹太移民女工)成立了国际服装女工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这成为美国第一个主要由女性会员构成的劳动工会组织。此后,该工会组织就开始在全国的各主要工业城市的工厂中发展会员,并建立地方分支组

^① Leslie Woodcock Tentler, *Wage-Earning Women: Industrial Work and Family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8.

织。^①1907至1908年,美国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家为了弥补损失,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更加严酷,罚款和增加劳动时间的名目更加繁多,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逐渐演化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次罢工发展成为了一场全行业的罢工运动,有两万多名服装工人参与。此次罢工所提出的目标是,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52小时,加班要付加班费,废除名目繁多的罚款,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等。^②经过艰苦的斗争与谈判,到1910年2月中旬时,纽约市所包括的450家女士衬衣工厂中有300家,实现了资方与罢工工人之间的协定。^③虽然这次服装工业全行业的罢工,一部分工人的要求全部或者部分地获得了满足,取得了部分成果,但是在很多工人在没有得到资方的让步的情况下,1910年2月15日这次罢工正式宣布结束,没有获得任何待遇改善的工人也不得不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尽管女式衬衣工人大罢工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它还是引发了服装工业连续十年的劳工运动风潮。

在连续十年的服装工业大罢工运动中,国际服装女工工会的成员数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最初的几千人迅速增加到1920年的10.2万名会员,也使之成为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中第六大工会组织分支。而男士服装产业也在犹太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成立了美国制衣工人联盟(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 (ACW)),到1920年时该组织也有17万名会员之多。^④在这场持续十年的服装工业工会运动中,女性是其中的主要力量,因为国际服装女工联盟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女性,而美国制衣工人联盟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会员,这些女性大部分都是有东、南欧移民背景的女性工人。特别是以犹太移民女性对工会的参与最为积极主动。犹太移民女性参与罢工工人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女工,即犹太女性占服装产业劳

① Louise Levine, *The Women's Garment Workers,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New York: B.W. Huebsch, 1924, p.383.

② Barbara Weithheimer, *We Were There: The Story of Working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p.239.

③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p169.

④ Louise Levine, *The Women's Garment Workers,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New York: B.W. Huebsch, 1924, p.383.

动力的55%,但是她们参与罢工运动的比例却高达66%至70%。^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1909至1911年罢工的初期,女性是最先在纽约、费城和芝加哥发起罢工的群体,规模超过16.5万人。^②更为可贵的是,女性还在罢工中表现出了比男性更富战斗性的一面。在1909年的纽约衬衣女工大罢工中,工会的管理阶层很多时候发现,在男性工人已经放弃罢工斗争的时候,女性还在严寒里坚持着。一位记者这样写道:“不管是警察、资本家雇佣的流氓捣乱分子、还是冬日的寒风和冰雪都不能动摇女性罢工者从早到晚地坚持斗争。”^③另一位当时的社会新闻观察员也写道:“如果没有得到任何资方的让步就停止罢工的工厂,一定是男性工人占主体的工厂。”^④不仅如此,犹太移民女性还作为领导阶层成功组织了由其他民族群体女性参与的罢工运动。1912年,波士顿的女士衬衣工厂女工,在国际服装女工联盟的鼓励下成立了女性工会组织。犹太女工在此次的工会组织、筹建中挑起重担,她们认为自己有为所有工友获取权利的责任,在随后与资方的谈判中,其他民族的女性工友也开始加入进来,并在犹太女性的领导下,号召全厂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工友们联合起来。而且,来自波兰、亚美尼亚和爱尔兰移民后裔的女性就业者,早已对犹太女性所主张的女性和工人阶级权利心生同情和向往,她们也纷纷组织起来走向罢工。^⑤

较之犹太移民,美国服装产业中的意大利移民女性,并没有积极参与劳工运动。例如,1909年的罢工运动中,尽管意大利移民女性在服装产业中的工人比例高达34%,但参与罢工的比例只有6%。^⑥以至于,以犹太移民女性为领袖的工会和劳工运动,对意大利女性工友产生了很多的误解,甚至认为她们是甘愿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民族。对于20世纪初期,犹太移民女性和意大利

① Meredith Tax, *The Rising of the Women: Feminist Solidarity and Class Conflict, 1880-1917*,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211.

②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pp.171-172.

③ Viola Paradise, "The Jewish Immigrant Girl in Chicago", *The Survey*, Spet.6 1913, p.701.

④ Elizas Tcherikower, *The Early Jewish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1961, p.152.

⑤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pp.189-190.

⑥ Colomba Furio, *Immigrant Women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The Italian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1880-1950*,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79, p.93.

移民女性对于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鲜明的差异,还需要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业结构和家庭环境中去寻找原因。意大利移民女性在罢工初期,表现出对劳工组织和罢工运动的迟疑态度,是与其民族传统文化、家庭观念和当时她们所处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的。首先,很多意大利家庭在当时极为困难的经济情况下,非常担心参加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会让本已摇摇欲坠的家庭经济走向破产。因为工会和罢工不仅仅是劳工间的互动和参与各种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也不仅仅是集体力量联合后的工资上涨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它还很有可能带来工运失败后的资方报复和失业。意大利移民女性在这种关系家庭生计大事的问题上,表现得小心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意大利移民传统的女性和家庭观念对其参与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例如,意大利家庭传统上对女性参与以家庭为纽带以外的人际网络组织有抵触的倾向。意大利家庭父权异常强大,意大利女性很少能够有机会参加与家庭和亲友无关的聚会,这对于她们参与劳工组织和罢工运动明显构成了束缚和障碍。^①例如,在纽约市举行的第一届服装工会成立大会上,一些意大利的丈夫或者父母竟然闯进会场,将他们的妻子或者女儿强行带走,原因是意大利移民家庭极力反对女性在外面抛头露面。^②在服装产业中,意大利女工中有38%左右的已婚女性,她们一方面面临繁重的家务负担,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积极地参加工会的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考虑劳工运动对家庭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女性完全脱离了20世纪初的劳工运动。实际上,从意大利移民女性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劳工运动表现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移民女性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斗争性。例如,在1913年,纽约意大利服装产业女工就表现出非常有斗争精神的一面,很多意大利移民女工参与漂白针织物和其他服装工人的罢工运动达一年之久。1919年,绝大部分意大利女工已经完全站到了劳工运动一边,愿意配合或者参与到罢工运动中。^③由此可见,意大利移民女性并非给世人留下的刻板印

① Colomba Furio, *Immigrant Women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The Italian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1880-1950*,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79, pp.27-28.

② Colomba Furio, *Immigrant Women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The Italian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1880-1950*,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79, p.274.

③ Edwin Gentio, *Immigrant and Unions, a Case Study: Italian and American Labor, 1870-1980*,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7, p.58.

象中不愿意参加罢工和劳工运动,只不过与她们的犹太姊妹们相比,显得慢一些罢了。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过几十年在美国的生活和人口繁衍,在美国出生的二代意大利女性进入就业岗位后,不但支持劳工运动,而且逐步成为劳工运动的先锋。1920年,国际服装女工工会联盟成立了第一个意大利工人群体分支——意大利斗篷女工第48分支(Italian Cloakmakers' Local 48),会员数量达到了7000多名,成为当时该组织人数最多的地方分支队伍。到1938年时,意大利女式套装女工形成的第89分支(Italian Dressmaker's Local 89),成为该工会最大的地方组织。^①

另外,移民女性为了保卫自身和家庭的利益,也使用诸如游行、示威等形式来进行抗争。例如,1902年,位于纽约下东区的犹太移民家庭主妇走上街头,联合抵制一种犹太教特殊规定的“洁净”(Kosher)的肉的价格过高,导致犹太移民家庭生活成本居高的恶果。对于纽约越来越高的房租,她们也联合起来游行示威。1902年,纽约下东区平均每户家庭的房租已经到了每月12美元,1908年又涨至14美元。1907年,纽约下东区600多名移民女性,主要是家庭主妇,联合起来走上街头共同抗议高房租,首次街头游行短短几天后,再次游行时便发展到2000多人。^②面对前来镇压的警察,这些妇女不畏强权,拿起扫帚、垃圾箱、鸡毛掸子作为武器保卫自己和游行队伍。虽然下东区的女性是用美国主流社会一贯宣扬的民主思想来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以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程序,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当时主流社会人口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他们就将所吹嘘的“民主”和“自由”抛在了脑后,主流社会最典型的观点,就如纽约警察主管斯蒂芬·宾厄姆(Stephan Bingham)用他极具种族优越感的口吻,对抗议的移民叫嚣道:“如果你不能接受现在房租价格,就自己卷铺盖走人,如果你对美国的房租体系有意见,你从哪来的就回哪去!”^③移民社区向美国主流社会表示抗议的食品、房租价格等事务的集体抗议,最后取得了部分成效。例如,一部分房东最终妥协,降低了房租,但

① Colomba Furio, *Immigrant Women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The Italian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1880-1950*, Ph. D. Dissertation of New York University, 1979, pp.244-245.

② Paula Hyman, "Immigrant Women and Consumer Protest: The New York City Kosher Meat Boycott of 1902,"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70, 1980, pp.91-105.

③ New York Times, 20 December 1907, p.16.

是更重要的是,移民家庭主妇通过集体抗议的方式向移民社区和美国社会,展示了她们作为女性的力量和捍卫自己家园不怕牺牲的精神。根据美国主流刊物《观察》的记载,下东区移民家庭主妇的抗议震动了曼哈顿上东区和上西区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对同为家庭主妇的移民女性表达了同情之意。^①移民女性和移民家庭所遭遇的经济上的困境,也逐渐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注意,这些都有利于移民女性自身和其家庭经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三、劳工运动对移民构建“新女性”身份的影响

移民女性通过劳工组织和罢工运动等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不仅彰显了她们力量和反抗精神,而且增强了自我新身份的认同。1912年,一位年轻的犹太女性服装工人说道:“既然经济状况迫使我们与男性一起在工业领域中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就业女性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愚昧地把男人当作英雄和主宰,我们只是在一起的合作关系而已,所以我们女性要拒绝继续在社会事务中扮演沉默的角色。”^②罢工运动后,年轻的移民女性自己也看到了令自身都意外的斗争力量,她们开始不满意作为不发声的另一半的角色,并希望她们作为男性合作者的伙伴地位获得认可并得到应有的尊重。移民女性在经济领域和劳工斗争中与男性并肩合作,她们对自己合作者的身份的诉求,就属于移民群体女性对自己新身份的构建和定义,而且是一种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女性的“移民新女性”身份的重塑过程。

从1890年至1920年间,美国主流社会最先将简·亚当斯那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的美国中产阶级土生白人女性,作为新女性最好的代表。这类女性投身于城市社会改革,她们被视为道德、宗教和精神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这类土生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确实扩展了19世纪中期以来“女性适合领域”的女性观念,但是她们实际上是将女性在家庭中作为母亲的角色延伸到社会改革中,认为女性在公共社会中从事类似家庭管理的方式,可以提高整个社会

① “The Rent Strike Grows”, *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 vol.19, 1907, p.1379.

② Nancy Schrom Dye, *As Equals and as Sisters: Feminism, Unionism, and the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0, pp.127, 133.

的道德水平,并且使一些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例如,被称为新女性的简·亚当斯、莉莲·沃尔德(Lillian Wald)等人认为,所有阶级的女性都远超她们同一阶级的父亲、兄弟和丈夫的道德水准,需要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团体,净化城市中工业生活的贪婪、腐败和浪费。美国本土白人女性的这种社会改革理念和新身份的展现也被历史学家称为“社会中的家庭管理者”(Social House-keeper)。^①

然而,新移民女性所塑造的新身份,完全没有像美国本土白人中产阶级社会管理的观念。虽然移民女性对于美国主流社会所倡导的女性特权,例如女士优先,女性道德高尚的看法也心生羡慕,但是她们更强调男女同等的尊重。移民女性也不需要成立与其族裔男性分离的单独的女性组织,因为,在她们看来,女性既不比男性好也不比男性差,相反她们作为挣工资者和少数民族,更容易因为自己身为劳工阶级和少数族裔而受到攻击,她们更愿意和本族裔的男性一起,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主张自己的权益,形成自己的新身份和文化认同。移民新女性在其他领域也和美国从事社会改革的新女性群体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中产阶级新女性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为了投身公共改革事业,很多人都选择逃避婚姻,转而和其他具有同样家庭、教育背景和奋斗目标的女性主义者共同生活。例如,赫尔会所的简·亚当斯、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主席格蕾丝·道奇女士,都将毕生的经历投入了社会改革事业中,终身未婚。但是移民新女性以工厂里的少女为主,她们并没有因为对新身份的追求而放弃基本家庭目标,相反在很多人的心里一直都存着结婚的念头。虽然也存在一些移民女性,例如犹太移民女性群体中产生的劳工领袖,因为事业而推迟或者放弃婚姻,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因为劳工运动思想而意图永久留在劳工组织的工作岗位上。相反,犹太激进主义的传统确实给予了普通犹太女性同时兼有革命和家庭生活的例子。^②总的来说,新移民女性基于在美国的新环境,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与男性合作关系的扩展,同时又结合其民族传统文化,将旧传统在新环境中重新

^① Estelle Freedman, "Separatism as a Strategy: Female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American Feminism, 1870-1930," *Feminist Studies*, vol.5, (Fall, 1979), pp.512-528.

^② Harriet Davis-Kram, "The Story of the Sisters of the Bund", *Contemporary Jewry*, vol.5 (Winter, 1980), pp.27-43.

演绎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新身份构建和认同。这是与美国本土中产阶级女性的新女性身份的重塑有鲜明差别的,成为20世纪初期,美国整体女性“新女性”身份构建过程中长期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移民新女性虽然与美国中产阶级新女性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是她们之间也存在非常良好的合作。虽然大部分新移民女性群体,并没有直接参与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选举权运动,对她们发起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的背景、原因、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十分明确,甚至也不甚理解,但是她们对这些女权运动的态度从整体上是支持和赞成的。1915年,纽约下东区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犹太女性都支持女性选举权运动。^①因为参加罢工运动促使她们对自身作为女性的力量有所觉醒,加入工会使她们认识到女性团结起来,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能保护家人和家庭不受损害。而对于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所倡导的女性应享有的选举权,以及这一权利背后所附带的公民责任,在移民女性看来,也包含着对女性力量和女性重要性的认可和褒奖,与她们所参与的劳工运动是不相矛盾的。而且对于两性合作程度较深的移民群体,例如犹太移民,其民族整体对女性选举权的获得也非常支持。例如,1915年和1917年纽约市两次关于女性是否应该拥有选举权的投票决议中,犹太移民选区表现出大比例的支持,甚至比上西区的美国中上层阶级表现出更为支持的态度。美国著名的犹太移民女性史研究专家埃莉诺·勒娜(Elinor Lerner)认为,不同群体对女性选举权的不同反应,所呈现出的规律大致是:在群体社会中已经有较多的两性接触和合作的更倾向于支持女性选举权,而反对者则在两性的合作上也表现得更少。^②犹太男性支持女性选举权的获得,说明他们也希望将女性在劳工运动中的政治用途和价值扩展到更多的社会领域中,因此,也希望在女性选举权的获得中得到共赢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从身为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女性政治权利的增强必然也能带来犹太移民政治权利的增强。

总的来说,罢工和工会的相关活动增加了移民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机

① Elinor Lerner, "Jewish Involvement in the New York City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 70, No. 4, 1981, p.448.

② Elinor Lerner, "Jewish Involvement in the New York City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 70, No. 4, 1981, p.351.

会,并且推进了女性涉足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基于同一阶级和民族基础上的两性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合作。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体现了女性工人的集体力量,让移民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对移民女性产生了新的看法,也引起了他们对移民女性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所遭遇的问题的关注。罢工和工会运动给年轻的移民女性提供了一个挣脱传统束缚,扩大女性社会角色和责任的机会,也是一次在美国社会大变革时代实验两性合作关系,并最终推动女性新的公共形象在美国的确立。